

再论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

朱宝树

在国土面积既定的情况下,一国的总人口密度势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密度已由1982年普查时的每平方公里105人增加到118人。而据有关预测,在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全国总人口仍将在下个世纪前叶增长到15~16亿的高峰,即届时全国人口密度将超过每平方公里160人。

目前,我国人口过密的矛盾在许多城乡地区已很突出,那么,随着今后全国总人口密度的继续增高,是否城市和乡村的人口也将同步地越来越拥挤、越密集呢?有没有可能在全国总人口密度继续增高的情况下,促使分城乡的人口密度增长得相对缓慢一些,甚至转为下降呢?笔者在拙作“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见《城市问题》1990年第6期)一文中,已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些初步分析,本文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日本的实例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1920年到1975年,日本全国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148人增加到297人,增加到原来的两倍。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内日本的城市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7341人降低到832人,乡村人口密度也由每平方公里121人降低到52人,即分城乡的人口密度分别下降了88.67%和57.02%。

显然,在全国总人口密度增高的同时城乡人口密度却都大幅度下降这一情况是与城

市化发展态势有密切关系的。从1920年到1975年,日本城市人口比重由18.0%增至75.9%,城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由0.4%

表1 日本都市化推移中的
城乡人口密度变化

年份	人口密度(人/KM ²)			城市人口 比重(%)	城市面积 比重(%)
	全国	城市	乡村		
1920	148	7431	121	18.0	0.4
1925	158	5912	123	21.6	0.6
1930	171	5234	129	24.0	0.8
1935	184	4449	122	32.7	1.3
1940	194	3115	118	37.7	2.3
1945	191	1379	133	27.8	3.9
1950	221	1548	130	37.7	5.5
1955	237	742	84	56.6	18.3
1960	248	720	70	63.9	22.3
1965	261	761	62	68.5	23.8
1970	278	792	58	72.1	25.6
1975	297	832	52	75.9	27.5

资料来源:(日)上野和彦
编《都市经济评论》,1980。

•乡村人口密度根据全国人口,
国土面积与城市人口、城市面积
的差额数推算。

增至27.5%。55年间城市人口由原来的330万人增加到8496万人,增加了24.75倍,而城市面积则扩大了67.75倍,于是造成了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同时,乡村人口由4586万人减少到2698万人,少了41.17%,而乡村面积则减少了27.1%,因此又促成了乡村人口密度的下降。这里反映了城市化对城乡人

口密度的双向绝对疏降效应。

从日本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变化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1920至1930年的城市化初始阶段,城市人口比重由18.0%增至24.0%,城市面积扩大幅度大于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乡村人口增长了6.87%,而面积却有所减少,因此城市人口密度下降而乡村人口密度上升。

2. 1930至1940年的城市化推进阶段,10年内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13.7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密度继续下降。乡村人口由4901万人减少到4553万人,减少了7.10%,但乡村面积仅缩减了1.50%,因此乡村人口密度也出现下降。

3. 1940至1950年的城市化波折阶段,因二次大战,日本的城市化出现倒退,城市人口比重由1940年的37.7%下降到1945年的27.8%,战后经过5年的复元才于1950年恢复到37.7%的水平。从城乡人口密度变化看,1940至1945年表现为城市人口密度下降而乡村人口密度上升,后5年则表现为较小幅度范围内的反向变化趋势。

4. 1950至1975年的城市化持续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由37.7%,上升到75.9%,上升速度的变化表现为先快后慢。因城乡人口与城乡面积关系的消长变化,城市人口密度表现为幅度不大的先降后升变化趋势,而乡村人口密度则大幅度地由1950年的每平方公里130人下降至1975年的52人。

不难理解,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主要取决于城乡人口与城乡面积增减量的对比关系。就城市面积扩大而言,除与原有城市范围扩大有关外,显然也与城市数目的增多有很大关系。从1920年到1975年,日本城市由83个增加到644个,增加了6.76倍。其中尤以1950年至1955年增长最快,这5年内日本城市数目由254个增加到496个,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从日本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

面积扩大及城乡人口密度下降幅度看,也皆以50年代的前5年为最大。当时日本城市大量增加与1953年实施城市“合并法”造成的放宽设市标准有关。因新确定的市大多原属乡村地域的人口集聚地,此类地域人口密度既高于一般乡村地区,又低于老城市,因此划入城市后使城乡人口密度都明显趋于降低。一些观察家认为,当时所有新确定的城市实际上并未都已城市化(C·D·哈里斯:《日本城市人口的增长》,Geographical Review, V. 72, no. 1, 1982)。指出这一点的用意主要在于说明,上述关于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分析是就全国整个城市(包括陆续新增的城市)或乡村的整体平均效应而言。

然而同时也应指出,日本继官方确定城市数量大量增加以后,又于1962年提出第一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其中心思想就是减少大城市集中程度,促进中小城市发展。日本通产省在人口稀疏区选择了256个地点,鼓励工业在这里发展。东京都和大阪市等大城市城区人口在1965年达到顶点后均出现了转为减少的变化势头,而周围中小城市的发展趋于兴旺。1975年以来,日本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大城市的职能和人口开始向外围中小城市扩散。50万人口以上城市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由过去的持续上升转为下降。这说明,以上所指的整体平均效应并不完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假现象,而是确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真实的体现。

二、我国的实际

我国总人口密度明显低于日本,但分城乡的人口密度却远高于日本,这显然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悬殊差别。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6.23%,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69%,后

者仅大体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上述关于日本城市人口的数据均不包括规模在2万人以下的集镇)。199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已比1981年增加了74.32%,但仍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134%。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1万人(因缺乏建成区人口数据,计算时近似地取市区非农业户口人口数)。当然,我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也可按市区人口和市区面积计算,例如,据此计算1987年我国市区平均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270人。但是,这并不反映我国真实的城市人口密度,因为,该年我国市区总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的比重达49.69%。而据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按行政建制分的市总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更高达56.91%。

关于我国的乡村人口密度,在具体计算时可把乡村地域界定为全国国土扣除市镇(市指市区,镇指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域,镇的建成区面积因无全面统计资料,只能根据某些典型调查结果按镇非农业人口人均用地约200平方米作粗略推算。乡村人口则特指全国总人口扣除市总人口和镇的非农业人口以后的剩余部分。这样计算的结果是,80年代以来我国的乡村人口密度大体约为每平方公里87人左右。

表2 我国城乡人口密度变化

	全 国 (人/KM ²)	城 市 (万人/KM ²)	乡 村 (人/KM ²)
1958	70.1	0.96	58.6
1963	73.7	0.97	61.8
1981	106.7	1.32	86.8
1984	110.4	1.30	89.3
1987	111.7	1.18	87.0
1990	117.9	1.11	87.7

笔者在“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一文中,已对我国城乡人口密度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城市化效应作了一定的分析,这里

不予重复。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在进入80年代以来确已出现了带有一定转折性的新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绝对疏降,而乡村人口密度则表明为相对疏降。所谓相对疏降是指一个时期内城市或乡村人口密度的实际增长率低于同期城市或乡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例如,1981年至1987年,我国乡村人口年均自增率为1.30%,如果没有城市化和迁移,那么期内乡村人口密度应按自增率同步增长,但实际上此期内乡村人口密度年均增长率仅0.08%,这就反映了城市化对乡村人口密度的相对疏降效应。

长期以来关于城市化的人口学及社会经济效应问题的论争一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而言,有的意见只强调城市化导致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集结从而促使大城市原已很突出的人口过密矛盾愈益加剧;有的意见则强调城市化大量挤占农村土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原已很突出的人多地少矛盾。事实上,城市化作为变乡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同时又把部分乡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决不可能对城乡人口密度同时起到双向加密效应,从总体趋向看,城市化发展可以对城乡人口密度起到不同程度的双向疏降(绝对或相对)效应。

诚然,我国80年代以来所显现的城市化对城乡人口密度的双向疏降效应与1982年以后市镇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以1990年与1982年相比,市由236个增加到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则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1978至1988年增设的地、县级市相当于建国后头30年设市总数的1.81倍,10年内中小城市个数增长149%,中小城市人口增加

110%，而大城市个数增长110%，大城市人口增加56%。可见80年代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城市。

不可否认，大量增设中小城市是促使我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与日本50年代前期的情况有所类似。事实上，许多大城市老城区人口过密的矛盾仍然相当突出。从按人口规模分组的城市人口密度看（指市区），在中小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趋于下降的同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市区人口密度仍在趋于提高（表3）。

表3 按人口分组的我国城市市区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

		合计	人口规模（万人）			
			>100	50~100	20~50	<20
人口密度 (人/KM ²)	1978	612	1269	586	347	168
	1982	603	1402	286	328	161
	1986	265	1480	358	181	35
土地面积 (%)	1978	100	12.1	28.0	26.9	33.0
	1982	100	11.8	29.3	26.7	32.2
	1986	100	3.8	7.2	18.3	70.7

由于缺少按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分组的资料，表3采用的是按城市市区人口规模分组的人口密度。我国城市建成区占市区面积的比重在1982年仅3.01%，至1986年更降为1.23%。显然，市区特别是新增的大量中小城市市区非建成区范围很难说已是完全的城市化地区。就城市建成区而言，中小城市人口密度趋于下降而大城市人口密度仍在提高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同时，许多乡村地区人多地少矛盾仍在趋于加剧的情况也客观存在。但是，能否因此而否认城市化对城乡人口密度的疏降效应或因这种疏降只是一种平均效应而否认其实际意义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 面临我国乡村人口城市化加快发展

的客观趋势，中小城市的发展对乡村人口直接流向大城市起到了重要的“截流”作用，这实际上就是对大城市人口密度起到了积极的疏降效应。

2. 发展中小城市为逐步疏解大城市过密人口提供了重要途径。尽管目前我国总体来看尚未出现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终将是会出现的。城市建制的增加与实际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如前所述，日本城市化发展中不是也出现过在一个时期内大量增设市建制的情况吗？所谓疏降效应，既要注意近期，更要注意长远效应。

3. 已在显示的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经常为许多城乡地区人口密度仍在有增无减的现象所掩盖。对人口密度仍在增长的城乡地区来说，如果没有城市化，其人口密度在很多情况下将会增加得更快。这里存在着一个是相对疏降还是绝对疏降的问题。

4. 我国8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疏降效应并非完全只是由于大量增设中小城市而带来的虚假平均效应。这种疏降效应即使在一些人口过密矛盾很尖锐的特大城市也已初露端倪。以上海市为例，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1990年全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04人，比1982年普查时的1917人增加了187人。但与此同时，市区和郊县的人口密度却分别由1982年的每平方公里2.72万人和938人下降到1990年的1.13万人和934人。当然，这主要是因市区面积扩大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1982年普查时相比，上海市中心街道的人口密度确已普遍下降，而市区外围街道的人口密度则明显上升。市区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在1982年是吉安街道，达每平方公里16.64万人，1990年时最高为露香园路街道，为13.64万人。露香园路街道的人口密度比1982年时下降了2.16万人。可以认为，上海在人口发展态势上的超前性

或先兆性，在城乡人口分布态势上也已开始有所显示。

三、比较与思考

城市化从其有利于转变乡村人口的传统生育观及降低生育率的效应看，曾被形象地比喻为是一种特殊的“避孕药”。由上分析我们又不妨可把城市化称作是一种对城乡人口密度的“稀释剂”。应当承认，城市化对城乡人口密度的疏降效应是客观存在，然而同时也应指出，这绝不意味着凭此“灵丹妙药”，我国人口增得再多、总人口密度增得再高也不足为虑。

如前所述，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直接取决于乡村人口转移量与城市面积扩展量之间的比例。其比例如果介于原城市和原乡村人口密度之间，即会对城乡人口密度带来双向疏降效应。然而，乡村人口转移量与城市面积扩展量都不能人为地任意摆布的。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城市化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外，还受土地资源有限的严重制约。当然，日本也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之一，其人均耕地水平比我国更低。但是，从人口与经济、资源的关系看，日本主要是依靠国外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从而维持高密度人口容量的国家。日本的许多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在美国专供种植出口农产品的耕地中，有800万公顷是专门供日本的，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本国耕地面积的1.67倍。我国的国情国力决定了我国的庞大人口基本上只能由本国资源来供养。为了加快“稀释”城市人口密度而大量挤占农村土地之举肯定是行不通的。

据国内有关专家预测，本世纪内按国民经济年递增8%左右，城镇人口递增4~5%的速度，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城镇人口可逐步增加到3.6—4亿人（其中城市人口2.3亿

左右，镇人口1.5亿左右，皆指非农业人口）。如要维持目前的城镇人口密度（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1.1万余人，镇建成区每平方公里0.5万人）的水平而不继续增密，2000年时城镇用地面积将由现在的2.41万平方公里增加到5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从1990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镇城建区成面积扩大需征用土地360万亩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六五”期间市镇建成区每年平均扩大用地面积的2.57倍。显然，在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首先要保证众多人口吃粮需要的情况下，每年要挤出360万亩土地（城镇建设占用土地多为优质耕地）供扩大城镇之用是很难办到的。

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客观制约，不可人为地加快或遏制，但是，对城市化在其客观发展进程中所可能显示的积极效应，人们是可以有意识地加以充分诱导和合理调节的。在全国总人口势将继续增长的既定态势下，唯有城市化才能促使城乡人口密度同时疏降。在今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应注意把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运用于城乡人口密度的合理调节，尽可能使分城乡的人口密度比全国人口密度增长得相对缓一些，笔者认为提出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需要指出，从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看，过去我们在征用农村土地吸收农民进城中的某些具体政策是有悖于城乡协调兼顾的原则的。例如，只按土劳比例吸收被征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而被征土地上的被扶养人口却仍被拒之于城门外。这就在无形中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这种倾向是应当避免的。城市用地扩展既应有利于城市过密人口的疏解，也应同时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以做，而且可以努力做好的。

（责任编辑 徐云鹏）